

薛暮桥文集

第九卷

薛暮桥文集

第九卷

(1981—1982)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铁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封面设计：吴锦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薛暮桥文集 (Xue Muqiao Wenji) / 薛暮桥著. —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

I. ①薛…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715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55 毫米 × 235 毫米

印张 339

插页 2

字数 4718 千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0 元 (总二十卷)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F. 546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目 录

第九卷

调整国民经济 搞好综合平衡 (1981年1月)	1
谈谈物价问题 (1981年1月)	12
对银行工作的一些意见 (1981年1月)	20
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何在 ——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封信 (1981年2月)	34
建议把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到比较重要的地位 ——给万里的一封信 (1981年2月)	38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 (1981年3月)	39
如何正确处理调整 and 改革的关系 (1981年3月)	50
从宏观经济来看怎样提高经济效果 (1981年3月)	60
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 (1981年3月)	67

为什么压缩投资反而能够解决供不应求问题? (1981年3月)	72
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给陈云的信 (1981年4月)	75
按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来调整经济结构 (1981年4月)	79
如何解决劳动就业问题 (1981年4月)	83
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 (1981年5月)	91
中国经济的最近动向 (1981年5月)	103
在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一次年会上的答问 (1981年5月)	108
在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1年6月)	111
现阶段国民经济的调整 (1981年6月)	114
怎样医治价格不合理这个顽症 (1981年6月)	125
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会议上的发言 (1981年7月)	134
关于恢复和发展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意见 ——给赵紫阳的一封信 (1981年8月)	139
提高农业经济学的科学水平 (1981年8月)	142
就改进飞机造林办法给雍文涛的信 (1981年9月)	151

从宏观经济看怎样加强经济核算 (1981年9月)	153
回忆杨东莼同志 (1981年9月)	158
就节约能源给姚依林、宋平、房维中的信 (1981年10月)	164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981年11月)	166
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环节 (1981年11月)	174
摆脱目前困难 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1981年12月)	181
给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年会的贺信 (1981年12月)	191
《中国经济年鉴》发刊词 (1981年)	195
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 (1981年)	198
怎样加强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 (1982年2月)	204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1982年3月)	211
关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1982年4月)	216
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 (1982年5月)	221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讨论 (1982年5月)	226
从实际出发, 深入研究提高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 (1982年5月)	238

《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前言	
(1982年6月)	243
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几点意见	
(1982年6月)	246
对《物价管理条例》的意见	
——给张劲夫的一封信	
(1982年7月)	260
《〈中国农村〉论文选》序言	
(1982年7月)	263
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	
(1982年8月)	268
就国营企业中实行工人自治给全国总工会的信	
(1982年8月)	277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几个问题	
(1982年9月)	280
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82年9月)	289
市场物价情况的讨论	
(1982年10月)	293
关于改革钢材分配办法的建议	
——给薄一波的一封信	
(1982年10月)	300
二十年翻两番是可以做得到的	
(1982年11月)	301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增订版前言	
(1982年12月)	305
就经济工作给赵紫阳、姚依林的信	
(1982年12月)	308
完成调整任务 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1982年)	312

调整国民经济 搞好综合平衡*

(1981年1月)

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办法，我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中已经作了一般性的论述，不想再重复。今天着重对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发生的一些问题，讲讲我个人的看法。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不容易讲得很清楚，也不可能讲得很确切。究竟我讲得对不对，要等今后几年的实践来检验。

一、此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特点

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整，是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春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来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都承认经过“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方针可供我们选择：一种是像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后需要调理那样，拿出几年时间来休养生息，调整国民经济内部关系，使压缩了二十年的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另一种是“四人帮”压在我们头上的盖子（“唯生产力论”）已经揭开了，有条件大干快上，苦战几年，夺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丧失了的十年时间。这时由于大家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还没有认识清楚，有些同志认识不到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左”倾错误，所以选择了后一种方针。1977年在农业中发动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和“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两个“大办”，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长期建设方面，把当年的农业生产耽误了，许多地区（特别是山西）还在推行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结果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增长。工业生产由于整顿了“四人

* 这是作者1981年1月14日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14.3%）。1978年在农业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生产迅速回升（9%），工业生产上升的速度仍然很快（13.5%）。这一年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由于我们向世界市场打开大门，许多国家争相向我国投资。这时我们的头脑更加热了，提出“四个一点”，要求大干快上。

应当指出，这时候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已经相当严重。这个比例失调，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从1958年就开始产生了。三年“大跃进”比例失调达到很严重的程度，1961年起进行调整，到1965年才开始恢复比较正常的状态。这使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浪费了八年时间，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虽然已经超过1957年的水平，但由于人口增长，生产效率降低，积累所占比例仍然太大，人民生活还比1957年的水平低一点。这时候绝大多数同志虽然认识了三年“大跃进”的错误，认为五年调整是正确方针，但是当时领导上不准批评“大跃进”，还要年年高举“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中还反过来狠批五年调整中的“退要退够”、“关停并转”等一系列正确措施，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四人帮”后，大家仍然心有余悸，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不敢触犯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这个禁区，所以经济工作中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不可能迅速纠正过来，1978年又一次犯了“洋跃进”（从国外购进二十二套成套设备）的错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这个禁区冲破了，认识了国民经济仍然比例失调，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并且指出调整是关键。这是我们三十年来经济工作的又一转折点。

此次调整的中心，是压缩经济建设规模，省出钱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次转变相当困难，原因是和60年代初期的调整大不相同。上次调整是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城市人民吃不饱饭，农村发生严重的饥荒，大家都感到非调整不可。此次调整是工农业生产上升，人民生活改善，因此大家感觉不到有调整的必要性。这一次“跃进”，从1970年就开始了，此后十年积累率年年超过30%。

1978年又一次“大跃进”，财政预算中的基本建设拨款猛增50%，积累率达到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这十年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是用压低人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1976年、1977年农民每人平均口粮低于1956年、1957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也下降了，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愈来愈紧张。与此同时，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不但轻工业的发展远落后于重工业，而且在重工业内部，能源和许多种原料的生产满足不了生产和建设的需要。许多工厂由于缺电，每星期停工二三天。许多建设单位停工待料，长期完不成建设任务。许多生产建设单位采购人员满天飞，看到短缺物资就抢购，自己用不着就放在仓库里面，用做交换自己需要物资的筹码，这样又加剧物资供应的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盲目追求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许多工厂为了完成增产计划，产品质量下降（质量不好也有人要），成本上升，产品不符合市场和用户的需要，有些产品供不应求，有些产品在仓库中积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还有许多厂矿为了突击完成生产任务，机器设备长期失修，采掘比例失调，寅吃卯粮。这种局面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如不及时纠正会使国民经济趋向崩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降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并下决心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在执行中，基建投资压不下去，计划内的投资没有完成压缩任务，计划外的建设显著地扩大了，加起来比上一年还略多一点；而改善人民生活却突破了原定计划，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8.5%，商品供应量增加15%，社会购买力却增加20%。因此就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并因此而多发了一点货币，物价难以稳定，人民对此不满。1980年进一步压缩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但计划外的仍在膨胀，加上上年增加的工资大部分推迟到这年来实现，还多发了不少奖金，因此财政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仍然有相当大的赤字，货币发行继续增加，这就为今年稳定物价造成更大的困难。

现在由于人民生活改善，市场商品供应增加，人民币的信用还是稳固的，城乡储蓄不断增加，巨大的财政赤字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用银行存款来弥补。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今年又有大量的财

政赤字，被迫增发货币，物价上升到一定的限度，人民币的信用有可能发生动摇，像60年代初期那样许多人向银行提取存款，排队抢购商品，就有可能使物价上升无法控制，几年来人民所得到的一点好处也会被物价上涨所抵消。所以，中央最近在召开计划会议的同时，召开省长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压缩今年的基建投资。一压再压，比去年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数字减少40%（从500亿元减到300亿元），并相应地压缩了一部分事业费、行政费、国防费，还要制止乱提物价和滥发奖金，以确保今年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这一次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是过去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积累起来的，调整两年效果不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主要的是积累基金压不下去，计划内的投资仍然过多，计划外的投资失去控制；次要的是消费基金也增加得多了一点，从1970—1978年，社会购买力平均每年增加92亿元，1979年一年就增加320亿元，1980年又增加350多亿元。这样，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就超过国民收入总额，产生财政赤字，并因此而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过去两年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可以用来弥补一部分的财政赤字，但仍然增发了过多的货币，这是近两年物价上升的根本原因。

克服这个困难的主要办法：

第一，继续压缩计划内的投资。不但国内的许多重大建设项目要下马，连从国外引进的许多项目有一部分也要停建缓建。基本建设是上马容易下马难。许多下马的建设项目，机器设备已经订货甚至制造出来了，不但要收货付款，而且要造仓库来保管维护，已经招收的几十万职工不能迅速遣散，在未安排好出路前还要照发工资。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项目，已签订的合同无法取消，损失更大。尽管如此，紧缩措施还应坚决执行。

第二，严格控制计划外的建设。多年来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集中过多，地方的机动财力太少，不能进行本地区急需的建设。特别是企业利润全部上缴，没有财力来进行必要的挖潜、革新、改造。前两年逐步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地方实行财务包干，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地方和企业掌握的资金显著增加。这些资金，一部分用来进行投资少、收效

快并且为国家急需的建设，效果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国家没有控制，地方和企业也用相当大一部分的资金进行了重复浪费的建设。如产棉地区办了很多小纺织厂，产烟草的地区办了很多小纸烟厂，使原来的大工厂因为缺原料而被迫减产，从全国范围来看造成很大的损失。从今年起，国家对地方较大的建设项目和企业较大的扩建改建项目都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层层审批。与此同时，还准备用国库券等形式吸收地方和企业多余的资金，由中央集中使用于国家最急需的建设上面去。

第三，对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幅度也必须控制，在目前特别要控制滥发奖金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取消奖金是错误的。这几年恢复奖金制度，用来奖励那些超额劳动、减少浪费和有特殊贡献（例如发明创造）的职工，从方针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许多职工生活还有困难，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思想影响很深，许多企业巧立名目，普遍发放奖金，最多的达到基本工资的半数上下。这不但大大地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引起各行业、各企业、各地区之间的苦乐不均现象，对因无营业收入而不能发奖金的教育、卫生、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影响更大。这些奖金很多是平均发放，不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对促进生产不起积极作用。这种现象如果不加控制，有可能因奖金过多而刺激物价上升，反过来又因物价上升而被迫多发奖金的恶性循环。国家正在采取种种措施，来制止滥发奖金的现象。

第四，近几年机关、团体、会议的膨胀，事业费、行政费、国防费的增加，也已经超过了国家财力的可能。今后几年我看有必要采取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方针，把几年来过分膨胀的空气压缩一下。总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有几亿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不可能把应办的事在几年内都办完，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几十年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普遍犯了一个错误。大家都想生产发展得快一点，所以把经济建设规模搞得太大，积累所占比例过高，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些国家想把人民生活也改善得多一点，消费基金的增长有时候超过生产的增长。这样国家分配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超过国民收入，引起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如果物价随之上升，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都部分地被涨价所抵消，实际实现的数

额仍然不能超过国民收入，还会引起经济上的波动和某些混乱。多数国家用财政补贴来制止计划价格的上升，结果增加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为了稳定物价，又不得不增加财政补贴。听说有些国家由于这种恶性循环，财政所支付的物价补贴高达财政总支出的30%~40%，摆脱不了这个恶性循环的困境。我国现在的物价补贴，也已经达到财政总支出的20%。我们必须下决心来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坚决压缩积累基金，控制消费基金，务必使两者合计不超过国民收入总额，从而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这样就可以保持市场和物价的稳定。在财政收支平衡，物价基本稳定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来逐步调整价格，进而缩小物价补贴，使国民经济达到全面的平衡。

二、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我国现在已经是将有近十亿人口的国家，其中大约有八亿是农民，多数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一部分职工的生活也有困难，因此，保证人民生活随着生产的增长而逐步有所改善，是我们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时所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我们应当争取用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三来保障人民生活，因此积累所占的比例一般只能保持在25%上下。在工农业生产中，我们首先应当发展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在这基础上来逐步发展重工业。我们经济建设的规模，也只能随着重工业的发展而逐步扩大。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上，我们应当首先安排人民生活，其次再按财力物力的可能来安排经济建设。当然，经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的建设规模就不能保障生产的迅速发展，从而也就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但是，如果我们经济建设的规模超过了财力物力的可能，那么不但会使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而且会使建设计划也因为缺乏物质保证而难以完成。

人们在从事任何工作以前必须首先把肚子吃饱，其次要身上穿暖。所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发展的水平愈低，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愈小。原始社会全部生产只够维持生活，几乎没有积累，所

以要过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生产才能有比较显著的增长。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了剩余劳动，但是积累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所以生产的发展很慢。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显著增加，生产增长较快，18世纪、19世纪生产的增长超过了过去二三千年。20世纪生产水平更高，可能积累的资金更多，虽然受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相对生产过剩的限制，生产增长的速度还是超过过去二百年。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5000~10000美元，积累率一般还只有15%~20%（只有日本有一时期超过30%），1979年我国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只有250美元左右，如果要把人民生活安排得好一点，把积累率提到25%上下，已经可以说是高水平了。三十年的经验是，积累率保持在25%上下，可以保持高速度，超过30%就会逐渐走向比例失调，甚至引来经济危机。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时期，积累率上升到接近40%，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相继倒退，人民生活显著下降。1961—1963年进行调整，积累率降到20%以下，1963—1965年工农业生产迅速回升。历史证明高积累不一定引起高速度、高消费，走过了头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时候由于我们没有可能总结这八年的经验教训，1966年积累率又上升到30%，接着就被“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全面内战”打乱了。1970年以后局面比较稳定一点，积累率又年年超过30%，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此后七八年的高积累，不但使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而且生产和建设内部也愈来愈比例失调。为了盲目追求10%以上（工业）的高速度，就不断扩大经济建设规模。经济建设规模大了，生产资料供应严重不足，因而又要求提高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远没有止境。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和1978年还提出了1985年生产6000万吨钢、25000万吨原油和4000亿公斤粮食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提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八大煤炭基地”等毫无根据的计划，造成现在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压缩空气”，陈云同志建议取消6000万吨钢等高指标，要做到计划不留缺口（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

衡)。为此就要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邓小平同志提出把积累率降到25%。这时候就发生争论，有许多长期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说：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只有增加积累才能提高生产增长速度，降低积累率就会降低生产发展速度，就不可能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客观规律。根据他们计算，积累率如果降到30%以下，生产增长速度就会大大下降；积累率降到25%就没有增长速度了，人民生活就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逐步下降，据说这是经过实际计算，有充分根据的。这一来，把许多同志吓唬住了，都不肯让那些超过客观可能的建设项目下马。他们说的究竟对不对呢？如果建设规模不超过客观可能，这是对的。问题是现在建设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计划不但不能留有余地，而且留着很大的缺口。几年前钢材供应是“三八制”，煤、电、水泥、木材、运输等没有一样能够保证供应。不但经济建设的物资供应留着很大的缺口，生产方面的物资供应也留着很大的缺口，许多工厂由于供电不足，只能“开四停三”甚至“开三停四”。建设供应不足挤生产，重工业供应不足挤轻工业，它们又共同挤农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明若观火，可是还有许多长期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视而不见，使前两年的调整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

这些同志还有一套理论，就是过去二十多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10%以上，1977年、1978年达到14.3%和13.5%，1979年一调整，工业增长速度就降到8%（计划数，实际完成8.5%），1980年再调整，又下降到6%（计划数，实际完成8.7%），今年又进行这样大幅度的调整，工业增长速度估计至多只能达到3%~4%，积累率降低，生产增长速度也下降，这不是已有事实证明了吗？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77年、1978年的工业增长不但部分地属于恢复性质，而且有相当大的虚假成分，许多工厂为求完成生产计划，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特别是生产了许多市场和用户不需要的产品，在仓库中积压，速度最高的机械和钢铁生产，产品积压也最严重。这样的高速度究竟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果呢？

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工业生产增长1%~2%是低速度，3%~4%是中速度，5%~6%已经是高速度。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由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些情况，它们生产效果较高，人民生活改善比我们快，它们是低速度、低积累、高效果、高消费；我们恰恰相反，是高速度、高积累、低效果、低消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速度和积累已经远远超过客观可能。生产和建设留了这样大的缺口，怎么能够保证经济效果呢？1979年和1980年主动降低生产指标，效果就比较好一点。1979年许多工厂能够比较合理地安排生产，有些工厂仍然因为追求速度，生产了不少不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1980年把计划增长速度降到6%，实际完成与上年相仿，效果可能比上年又好一点。由此可见，过高的速度是生产低效果的主要原因，过高的积累是建设低效果的主要原因。70年代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比较，生产和建设的效果都显著地降低了，就是因为生产速度和建设规模都已经远超过客观可能。经济工作中的这种“左”倾错误，不但已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还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些同志又说，我们也主张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但是已经上马，下马要造成巨大的浪费。是的，下马的浪费是很大的，但不下马又如何呢？按1978年所规定的规模干下去，不出三年积累率又会上升到40%，肯定会再来一场大倒退、大灾难。1978年决定上马的项目，它的后果不表现在1978年、1979年（这时大多还在做准备工作），而主要表现在80年代初期，因为这时候才达到建设的高峰。1979年、1980年两年，我们两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有许多大中型项目下马，但这些项目的投资不可能完全减下来，已订购的机器设备还要付款，建设队伍不能迅速遣散。这是我们前两年虽然下了一批建设项目，仍然出现大量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今年有更多的大中型项目下马，虽然可以节省200亿元投资，但所付的下马费将比前两年更多。特别是从外国引进的项目，订购的机器设备如何处理，比国内的产品更困难。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三四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调整的困难，但不下马，困难愈来愈大。只有决心下马，忍受几年困难，才能从被动转入主动。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引进项目，不但在建设时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即使建设完成，也存在许多问题，甚至使我们更加困难。因为我

国现在缺乏能源，交通运输也是短线。引进的项目，绝大部分不是增产能源，而是要消耗大量能源（耗油、耗煤、耗电），并使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化肥、化纤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如果建成以后缺乏原料（原油），缺乏电力，被迫停工，我们将用什么来对外国贷款还本付息呢？所以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可能仍然成为我们沉重的负担。迟下马不如早下马。下马不能不忍受巨大的损失，不下马将来所受损失更大，这是我们过去两年反复考虑，现在仍然只能下决心停建缓建的重要原因。今后我们还是拒绝利用外资，但是必须偿还期长、利息低，用来进行能源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现在我们在东海、南海、渤海利用外资进行海底石油勘探，就属于这种性质。此外，投资少、见效快的像来料加工和技术革新等类的建设，现在还可以继续进行。

前年原油、煤炭很少增加，去年还略有下降，但我们的工业生产仍然是高速度（8%以上）增长。今年煤炭、原油可能继续下降，因此工业生产的发展困难更大。能源不能增加，是不是前两年压缩经济建设投资造成的呢？显然不是。一方面我们在压缩投资的时候，能源的投资不压缩、少压缩。即使压缩，也要在五六年后才会产生效果。这几年原油、煤炭不能增产，甚至下降，是前几年为求提高当年产量，采掘（煤炭）比例、采勘（石油）比例失调，寅吃卯粮所造成的。为了使产量不致继续下降，这几年我们必须用较多的力量来掘进和勘探，恢复本行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工业增产速度呢？一个是节约消耗。现在能源浪费很大，节约能源刚刚开始，还有很大的潜力，搞得很好可能用同样多的能源使工业生产增长1倍以上（日本消耗同样多的能源所生产的工业产品等于我们的4倍多）。另一个是改变工业结构，即多发展轻工业，少发展重工业。轻工业部计算同样生产1万元产值，重工业耗煤17吨，轻工业耗煤3.5吨，重工业耗电5500千瓦时，轻工业耗电1780千瓦时，相差3~4倍。二十多年来，我国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几乎年年超过轻工业，这两年倒过来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重工业（1980年轻工业增长18.4%，重工业增长1.4%）。这不但可以保持工业增长速度，而且可以保证市场商品供应，使人民生活能够逐步有所改善。